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邢義田 黃寬重 鄧小南 總主編
蒲慕州 主編

生活與文化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生活與文化

蒲慕州 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新學
社
PDG

總編輯:徐惟誠

社 長:田勝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生活與文化/蒲慕州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10/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ISBN 7-5000-7314-3

I. 生... II. 蒲... III. 社會生活—歷史—中國—文集
IV. D691.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40990 號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阜成門北大街 17 號 郵政編碼:100037 電話:010-68315609)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市智力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635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張:35.75 字數:50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冊

ISBN 7-5000-7314-3/K·458

定價:55.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與出版社聯系調換。

總 序

邢義田

爲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臺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臺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見。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爲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臺灣學者的或在臺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複收入。爲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爲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爲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前期出版者爲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餘年的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臺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臺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的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爲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臺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1〕}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1949年前後來臺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臺灣的學術園地如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原稱師範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2〕}從1949到1987年解除戒嚴，臺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如此隔絕的環境下，臺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臺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詒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裏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3〕}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聽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聽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臺灣，生活艱

〔1〕 可參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79年；張玉法《臺海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1949～199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1994），頁47～76。

〔2〕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臺灣唯一一所高等學府是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收復後，日籍研究人員離臺，仍在臺大的教員有楊雲萍、曹永和、徐先堯等少數人。但他們的研究此後並沒有成為主導的力量。請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年，頁3。

〔3〕 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頁6。

困，爲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爲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鉅釘補注；或遠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臺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繫。新生的一代同樣爲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臺，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臺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爲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爲建立理論立下更爲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臺灣恢復出刊，成爲臺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臺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爲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L. V. 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爲臺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係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寶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臺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4〕}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臺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佈，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源源而入。以臺大爲例，

〔4〕 參張玉法，前引文，頁76。

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啓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入書庫，複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聽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 L. 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 A. 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瑟（J. 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聽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聽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哈（Wolfram 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誌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爲主的《思與言》雜誌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爲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儘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莊，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風靡一時，無數的心靈爲之擺蕩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誌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衝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臺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蕩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臺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爲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爲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臺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臺大歷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係。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

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和法國年鉴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鉴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鉴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臺，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櫟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臺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5〕}

曾影響臺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裏說：“回顧五十年來臺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6〕}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

2004年12月

〔5〕 請參本叢書《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彭明輝所寫《導論：方法、方法論與歷史解釋》；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

〔6〕 許倬雲《錦瑟無端五十弦——憶臺灣半世紀的史學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頁14。

導

言*

蒲慕州

一、史學研究的新方向：生活史研究

二十世紀的大變動在人類歷史上也許不能算是最劇烈，但若就人對世界和自身的探索而言，所呈現的面貌，可說是空前的複雜而變化快速。自然科學家探索的世界一方面不斷地擴大，一方面也不斷地縮小。黑洞的理論和微中子的發現正可以作為例証，而這兩個發現無疑在不久之後就會被新的進展取代。科學家的發現，如同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一樣，其實只是更進一步地看到那些原本就存在的現象，他們並沒有在實質上改變世界的存在狀態，然而人在看到了一些原本看不到的現象後，卻會產生實質上的改變，包括對於人與世界的關係的瞭解，或者人存在的意義等等。在人文社會科學，包括史學，二十世紀以來的進展也曾有過相當重大的變化，最近的風潮，當然就是所謂的後現代主義。

在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之下，學者中開始有一些人比較注重研究者在認知上的限制，開始從根本質疑學者能夠客觀的瞭解其他文化並且得到所謂的真正面貌。“後現代”本身雖是一個相當難定義的概念，但基本的特徵應該是懷疑或崩解既有的價值判斷，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檢討人自己（或者說，研究者、學者）在做任何主張或者引用各種理論時，其背後到底是否基於種族主義、男性中心心態、西歐優越心態（或帝國主義）等等有意無意的動機。^[1] 這種看事情

* 本文原題《生活史與人類學》，收入《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頁317～333。今增修部分材料，以為本冊導言。

[1] 參考 Jerry D. Moore, *Visions of Culture*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997), pp. 261～263. 至於對後現代主義影響的堅決抗拒，可以舉一例為代表：M. E. Spiro, *Gender Ide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ix～xvii. 又有關雙方的辯論，可參考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的態度對於史學也產生相當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蘭克史學那種樂觀的心態，以為研究者只要掌握了完全的史料就可以客觀而真實地重建過去歷史，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也經歷了相當複雜的轉變。我們只要瀏覽馬克思史學、歷史主義、歷史相對論、心態史、新文化史等各種不同流派的相繼出現，就可以感到這變化。史家所重視的，不只是所使用材料的真偽、性質、所研究問題的意義，更進一步要反省研究者個人的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在研究中所造成的影響，因而對於歷史真實性的問題也採取更開放的多元思考：什麼是所謂的歷史事實？就我們所能掌握的任何材料而言，是在何種情況之下，經由何種途徑，為了何種目的而留存下來的，又能夠讓我們去瞭解到多少“真正發生的事”？真正發生的事是否對每一個“當事者”都是一樣的？為什麼要瞭解過去發生過的事？誰決定要瞭解過去的那些事？被選來作為研究對象的過去之所以被選出，是根據什麼理由？這些考慮不必然是所謂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但足以顯示史學研究者的自覺意識因為大環境的緣故而提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

除了態度和方法的改變之外，新議題的開發也是近年來史學研究的特色。在傳統政治史、制度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等研究範疇之外，一些長期未受注視的主題開始有學者致力，這些包括有關人物的女性史、兒童史、老年史以及有關活動的醫療疾病史、人口史、生活史、庶民文化史等等。其共同的趨勢是重新評估所謂歷史的主體到底為何，而共同的結果是肯定一種多元的瞭解歷史的角度，同時認為只重視社會上層階級之活動的傳統研究取向有其嚴重不足之處。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生活史的研究角度，以及這種研究角度和人類學研究的關係。

什麼是生活史研究？從字面上來說，它是企圖重建人們過去的生活面貌的一種史學研究。然而“人的生活”是一個何其寬廣的範圍！它可以大到無所不包，如果不加以界定，顯然會失去作為一種研究範疇的效用。什麼樣的歷史才是生活史？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依我看，不在於找到一種完備的定義，而是在逼我們想想，在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經濟史、社會史、宗教史、思想史之外，是不是還有一種探討過去的途徑，也就是從生活的角度來看歷史上的一

些現象。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宗教思想的問題和材料基本上也都可以是生活史的材料，不同的，是生活史的觀察角度不同。

我目前的看法是，生活史的範圍主要包括過去人們的日常生活的物質面和精神面的各類問題。物質面的問題，如果用食衣住行四大項來概括，可以包括許多的內容，如醫療、飲食、服飾、器物、建築、交通、生產，乃至於娛樂、遊藝等等；精神面的問題，我認為包括了各類的人倫社會關係，如兩性、親屬、上下同儕以及宗教信仰和生老病死等人生階段的處理等等。這些問題在所謂的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較傳統的研究範疇中當然也不是不會觸及，它們所利用的材料有許多也都是相同或者類似的，然而生活史研究把傳統史學中比較邊緣的問題放到關注的重心上，由關心過去社會中人們——尤其是所謂一般大眾——的生活面來進入歷史，是研究者角度和價值觀的重大改變。不消說，這種不同的角度並不準備，也不可能，去取代傳統史學研究範疇，因為它的價值觀原本即為多元的，認為歷史應由多重角度去瞭解。在此應該稍做說明的，就是近數十年來生活史研究，其實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人類學的影響。自十九世紀末人類學興起之後，歷史學和人類學就不斷地相互較量，爭取釋解人類社會的發言權。但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往來。Frazer 的著作雖然用了大量的歷史材料，但他的興趣主要是用材料作為比較宗教的素材，而不在歷史發展本身。至於 Malinowski 和 Radcliffe-Brown 所提倡的功能主義，就更明白地表示，瞭解一個社會，只須明白社會各部門的功能及運作，歷史是不相干的。Durkheim 的社會象徵學說也屬於非歷史的陣營。這些學者的影響一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消失。

二十世紀中期之後，情況有一些轉變，包括 Evans-Pritchard 和 Mead 在內的一些人類學家開始覺得人類學和歷史學應該有相互借鏡、相互合作之處。歷史家處理時間縱軸的變化，人類學家則處理平面空間的結構。這當然是說來容易。因為沒有史家只處理時間的變化而不觸及空間的結構，而人類學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忽略時間在社會制度上造成的影響。1966 年，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協會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了一場以“歷史學和人類學”為主題的會議，正式把兩者之間的關係搬上檯面。此後歐美學界出現了不少利用人類學概念分析歷史的作品，也出現了不少重視歷史材料的人類學作

品。人類學者不再完全以發現文化類型和結構為主要興趣，而歷史學者則是如人類學者般地對歷史上人們的生存狀態進行研究，^[2] 開啓了一連串的綜合史學與人類學概念的作品。^[3] 我在此不擬做一個全面的檢討，^[4] 但想要強調的是，從史學研究者的角度來看，人類學對史學的影響主要在提醒史家，史學研究如果能够強調文化的距離感，也就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文化上保持一種“陌生感”，^[5] 讓史家重新檢討一些習以為常的文化現象，重新解釋，將熟悉的材料“問題化”（problematize），應該可以發現許多新的議題。在這種認識之下，中國近代史家所熟悉的那句名言，讀史者應該對國史具有“溫情與敬意”，^[6] 其背後的預設立場為何，在史學研究方法上有何影響，倒是值得再三深思。其次，人類學強調每一文化的內在邏輯，認為文化中每一部分都是形成一有機整體的要件，^[7] 因而史家在研究過去社會時，也應重新檢討從前以為不重要的材料，從而形成新的對過去的認識。婦女史、兒童史、生活史等等史學的新領域就和人類學的刺激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當然不是說，史學與人類學已經進入大融合的階段，因為歷史學者的歷史和人類學者所有興趣的歷史仍然有相當不同的重點，而歷史學者所有興趣而引用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也有流於機械地套用或者皮毛地瞭解的危險。

回到生活史的研究，上面所建議的生活史的研究範圍其實與一般意義的人類學研究的範圍有許多重疊之處，以致有學者甚至認為歷史人類學的興趣就是生活史。^[8] 我曾經在一篇介紹西方近年來生

[2]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1).

[3]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4] 請參考 David Gaunt, *Memoir 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Stockholm: The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s, 1982); E. Ohnuki-Tierney ed., *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san Kellogg, "Histories for Anthropology: Ten Year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Writing by Anthropologist, 1980~1990,"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5:4 (1991): 417~455.

[5] S. C. Humphreys, *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 26.

[6]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國立編譯館，1970），頁1。

[7] S. C. Humphreys, *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 pp. 27~28.

[8] Mary E. D'Agostino, "A Full Complement: Employing Diverse Sourc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Kroeber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79 (1995): 116~136, esp. 116.

活史研究的文章中，^[9] 提出一項觀察，認為西方近代史家對於生活史的探討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相對應於兩類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類作品，基本上採取全面描述一時一地人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的方式，企圖給讀者一個有關當時人生活的圖像。這類的研究，雖然有些類似人類學的田野記錄，但基本上由於並不提出特定的理論架構，因而其結果是觀光式的，做為點綴式的對歷史的瞭解。這類作品常以《某某時代的日常生活》為題，在西方史學作品中已經有相當久的歷史。第二類作品，則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問題為中心，重視生活情境背後的文化心態，設法從這一問題在時間中的發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與變，並且設法與該社會的整體結構取得聯繫。這第二類作品也正是或多或少與人類學結合或受人類學方法影響的結果。以下我就在西方近年來的研究中舉一些例子來說明生活史研究有那些可能性。必須先說明的是，書名中有生活兩字的書很多，它們不一定代表相同的內容，也不見得代表類似的討論方式和眼光。而我打算把生活史的作品分為三類來做介紹。

二、百科全書式的日常生活史

有些作品雖然在書名中有“生活”兩字，但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偏重社會經濟史的通史類作品。在本世紀早期就有一些作品。這類的作品基本上是一種老式博物館式的文物陳列式的寫法，把某一段歷史中的“文物”一一加以描述，讓讀者對某一特定對象有一種所謂“全面”的瞭解，就算達到了目的。在古代史方面的作品譬如 P. Montet, *Everyday life in Egypt in the days of Ramesses the Grea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58), Robert Flaceliere, *Daily Life in Ancient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5), Jerome Carcopino,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tr. E. O. Lor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等。以後者為例，他的書是以羅馬城的生活為對象，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討論羅馬生活的物質和精神背景，這些背景包括羅馬城的人口和城市範圍、城內的建築和街道、社會階層和人口結構，包括奴隸問題，接下來是家庭、婚姻、婦女地位、

[9] 蒲慕州《西方近年來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學》3卷4期（1992）：139～153。

教育和宗教狀況等。第二部分是談羅馬人生活一天從早到晚的各種活動,包括對於各種行業的描述,以及羅馬人的休閒生活,譬如各種表演和比賽、去公共浴池消磨時間等等。類似較近的作品如一種叢書:“Daily Life Through History”由 Greenwood Press 出版,包括 Jeffrey L. Singman, *Daily Lif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Jeffrey L. Singman and Will McLean, *Daily Life in Chaucer's England*; Michael A. Malpass, *Daily Life in the Inca Empire*; Robert J. Sharer, *Daily Life in Maya Civilization*; Sally Mitchell,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yron A. Marty, *Daily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 ~ 1990: Decades of Discord*; David Carrasco with Scott Sessions, *Daily Life of the Aztecs: People of the Sun and Earth*; Karen Rhea Nemet-Nejat, *Dail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8)。以最後一本為例,作者在簡單的給了一個關於兩河文明的地理和歷史背景的說明後,以文字、教育、文學、科學、社會生活(包括農業、遊牧、居家、家庭、財產、婦女地位、飲食、娛樂(包括狩獵、運動、音樂、舞蹈)、宗教信仰(包括神明、崇拜、祭典)、政府、經濟(農耕、貿易)等主題為討論對象,實際的結果,等於是一部兩河文明的綜合介紹。比較簡單的有 H. W. F. Saggs, *Everyday Life in Babylonia and Assyria* (New York: Dorset, 1965), 是混雜了歷史和文物生活介紹的通俗作品。類似的書還有 Daniel C. Snell,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這兩本書所使用的材料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研究成果,但是它的基本結構和寫作的方法和眼光仍然是十九世紀的,可以說與 Georges Contenau, *Everyday Life in Babylon and Assyria* (New York: Norton, 1966); A. Erman, *Life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Dover, 1971, reprint of 1894 translation); 或甚至更早的 J. G. Wilkinson,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New York: Crescent Books, 1988, reprint of 1853 ed.) 沒有太大根本的不同,由此也可見這一類的作品一直會有它的讀者。

在歐洲史方面, Paul Zumthor, *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reprint of 1962 ed.), 也屬於這類作品:作者先介紹十七世紀荷蘭的城市結構,食衣住行各方面的情况,生老病死的過程,再介紹各種娛樂和文藝活動,以及社會階層和工商業的組織等等,目的在重現一時代荷蘭人生活的大概內容。

在中國史方面，早在1965年就有Michael Loewe, *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本書內容仍然是大歷史式的，全面包括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工藝、宗教、文學等各方面，而Jacques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Mongol Invasion 1250 ~ 1276*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2) 則比較更集中於社會生活方面。

可以說，這類的日常生活史其實是對某一段歷史和文明做綜合介紹，主要的預設讀者群是初學者或者有興趣瞭解此一段歷史和文明的一般讀者，其功用主要是提供資料，引起興趣。

三、主題式的日常生活史

由百科全書式的日常生活史，進一步的發展是針對某些主題而做的討論，這類的作品不再求百科全書式的全面描述，而是希望藉著討論一些作者以為具有關鍵性的問題而對一時代有更深入的瞭解。英國學者Joan Evans在1925年出版的*Life in Medieval France* (London: Phaidon, 1925, 1969) 就是一個例子。作者在書中除了給一個有關封建社會的背景描述之外，她並沒有巨細靡遺地把所有關於中古時代人的食衣住行的生活細節都加以介紹，而是分別討論了城市生活、寺院生活、朝聖和十字軍、教育和學習等項目。作者顯然以為這些項目是瞭解中古法國人生活情境的重要關鍵。以書中的城市生活一章為例，作者的討論主要在說明中古時代法國的城市興起的一些政治和經濟背景、商人組織和稅務問題，以及城市中人們日常生活的一些點滴。Evans的立場明顯是崇拜法國，因而書中幾乎找不出對當時社會的黑暗面的批評。

與她同時的法國史學家Lucien Febvre則不同，他在*Life in Renaissance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相當真實地指出十六世紀法國仍然是以鄉村農業為主的地方(其實這時所謂的法國在領土範圍上因為各種封建關係而相當複雜而變動不居)。不過他的書主要談的是當時人在知識上、藝術上、宗教信仰上以及經濟活動方面的一些情況，為的是要“找出所有那些可以代表此一時代人們的最高的希求和執着，他們對知識、美和上帝的追求。”他以相當具體的材料顯現出當時人的思想和行為，是相當有啟發性的，但問題是，他

所談的生活，其實主要是思想生活，以及思想與物質環境的關係，如當時的教育和學習以及書籍的傳佈等問題。

另一本類似的書是 Pierre Riche, *Daily Life in the World of Charlemagn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8)。這是一本內容相當豐富的關於中古早期（八世紀中至九世紀末）加洛琳王朝時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品。作者從地理環境、民族構成、交通、自然資源、城市、鄉村、教會、修院、宮庭、人口結構等基本條件的討論出發，再討論社會上各階層人們的生活情形。他特別談到當時各種農業及工藝的進展情況，再進而討論宗教信仰，包括教士的訓練和傳統非基督教的因素，以及貴族生活，最後並且論及當時的社會問題（乞丐、盜賊）和民族問題（諾曼人入侵），以及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民和貴族及教會之間的保護關係。同樣的，他也没有採取百科全書式的作法，而是企圖建構一個有機的、各個因子相互關連的生活情境，這種作法應該是受到人類學方法的影響。由社會經濟史出發而對一般農民生活有較深入討論的例子，是 Christopher Dyer, *Everyday Life in Medieval England* (London: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0)。此書雖為論文集，其中有不少篇章是和生活史相關的，如中古後期農民飲食習俗及內容的改變，某些食物所具備的象徵意義，農村房舍的建築，菜園池塘中的收穫與地位的關係等等，證明生活史是從關注人們生活角度而出發的，其基礎仍然不脫堅實的對材料的掌握及分析。

四、專題式的生活史

前面這種主題式的生活史，雖不再企圖全面呈現一時代一地區的“生活全貌”，仍然是在設法用一些主題來建構一時代人們的生活情境。但還有另外一些作品，針對歷史上某一時代和地區的食衣住行娛樂宗教節慶或者某類社會階層的人物，或者某種社會生活形態，來進行討論，企圖對某一類生活現象有深入的瞭解，再由這瞭解來重新考量那特定文化或歷史的特質。以下我就分類簡單地介紹西方學界在各個主題的研究，和臺灣學者在相關主題方面的一些成果，其中也包括本冊中所選刊的文章。

(1) 飲食

如果以食衣住行爲出發點來看目前生活史研究的成果，可以發現這幾方面的成果是不平均的。有關食物的研究，由於牽涉到一群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一向是人類學者重視的範圍。與食物或飲食文化有關的一些關鍵問題包括營養、口味與烹調、價值與象徵意義等等，食物的分類（生與熟，可吃與不可吃）、處理（烹調技術，文化特性）、象徵及儀式意義（禁忌，污染與神聖）、與社會身份的關係（年齡，性別，地位）、生產與支配關係等等，都成爲討論的題目。^[10] 不同的飲食方式可以建立文化認同，分別族群，尤其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中，飲食習俗常成爲文明與野蠻的判別準則。古代兩河流域地區人們描述游牧民族的文字中，生食肉品是野蠻的象徵；^[11] M. Montanari, *The Culture of Food* (Oxford: Blackwell, 1994) 一書就指出，羅馬帝國時代，日耳曼人被認爲是蠻族，特徵是吃牛奶、乳酪、肉類，這是相對於“地中海型飲食”以麵包、酒、橄欖油等爲主要食物的羅馬人的飲食習俗而言。當後來日耳曼地區進入帝國範圍，“食肉者”又成爲更外圍的族群的特徵。^[12] Montanari 書本身主要是歐洲飲食習慣和食糧生產系統以及消費模式的一部長時段的歷史。專門研究希臘人飲食習俗和對美食的討論的書，有 Andrew Dalby, *Siren Feasts: A History of Food and Gastronomy in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1996)。不過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飲食百科之類作品，作者收集了各種有關飲食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再配合現代的情況，對希臘到拜占庭時代的飲食作了詳盡的報導。與這本書的出發點很不同的，是 Stephen Mennell, *All Manners of Food: Eating and Taste in England and Franc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作者的出發點是社會人類學的角度，但基本上重視的議題是飲食習

[10] Pasi Falk, "Homo Culinarius: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ast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30, 4 (1991): 757 ~ 790; 許木柱、簡美玲《飲食與文化——人類學觀點的回顧與展望》，《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5），頁 65 ~ 82。對於結構主義式的有關食文化的解釋也有批評者，見 S. Mennell, *All Manners of Food*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pp. 6 ~ 15。

[11] J. S. Cooper, *The Curse of Agad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p. 32。

[12] M. Montanari, *The Culture of Food* (Oxford: Blackwell, 1994)，pp. 5 ~ 11。